

台灣文化邊緣化及 主體性返復

/ 李敏勇

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返復，在台灣歷史發展上，有其政治的文化的軌跡，但在建構的道路上，文化面的繁複比起政治而言，是更為重要的課題。

一九四五年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結束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但台灣並沒有像朝鮮一樣獨立起來。在戰後世界，許多新興國家出現的歷史裏，台灣繼續被外部來的統治權力進駐，成為特異的存在。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四年間，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仍然控制著中國大陸，對於中國而言，台灣是邊緣的轄地。但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另成立了新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雖然標榜為中國，但實際上只有台灣這個島嶼。從以內地為中心到以邊緣為中心，統治權力的屬性經歷了重大的量變。

為了有效統治台灣，國民黨統治權力控制的中華民國，進行長期的戒嚴統治和透過不改選國會來鞏固體制，配合政治需要的文化工程是在台灣把台灣文化邊緣化及強化統治權力從中國帶來的文化正統。

回顧戰後歷史，國民黨統治權力仍轄有中國大陸時期，就在一九四七年引發二二八事件，造成大量的台灣菁英份子喪失生命，連帶的打擊壓制了台灣文化力，為後來國民黨統治權力全面退治台灣做肅清整備。

一九四九年起，國民黨統治權力的文化機制，全面服務於政治需要，以中國的，統治

體制形式，全面清除了台灣在文化解釋權的條件和能力，台灣雖然已成爲國民黨統治權力控制的國家名號統轄的全部（除了金門、馬祖），但卻成爲相對中國的邊緣體，台灣文化的邊緣化歷史隨著統治形式的需要進行著。

戰後長期以來，從國語、國文、國畫、國樂……在台灣內部構成了國家與地方，中央或中心與邊緣的文化對峙狀態，從教育到大眾傳播，從政府體制到民間，無不極盡將台灣文化邊緣化。造成台灣把自己的戰後歷史開展成爲邊緣化的軌跡。

如果再追溯更早的歷史，缺乏主體性的台灣，其實是在內部的鄉黨意識局限下，長期在既非中國大陸的中心，自我亦未形成中心的邊緣化形勢中發展。大清帝國時期，日本殖民主治時期都一樣。

在尚未形成國家條件，台灣文化未發展到以國家爲形式的主體性層次之時，台灣被大清帝國割讓給日本，面對已經相當程度近代化的日本被以政治的、經濟的，更以文化的手段宰制下的台灣，可以說是日本化的過程。日本化，意謂著日本文化化，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形成是困難的，相對於日本，台灣只是內地的延長，特別是日據時代實施的國民教育體制，台灣人被教育成日本人的近代化養成，同時也是自我邊緣化的歷程。

戰後的國民黨統治權力，一方面努力清除日本統治時期的文化影響，一方面努力灌輸替代性的文化意識與思維，藉著所謂的道德，藉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長期滲透，台灣文化被壓迫爲相對卑俗、粗糙的存在。

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國民黨統治權力的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全面受挫。台灣內部的自覺與自救力量要求台灣的台灣化，展開了追求在歷史發展自我意識形成的軌跡，並且推動重新建構文化和政治的自我體系，自始，台灣文化被長期邊緣化與主體性返復的努力相互作用的。

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返復，帶有台灣人自覺與自救運動的性質，基本上是在台灣社會形成某種程度的經濟條件，在面對國家的外部處境變化及內部國民黨統治權力的不當性展現出來的政治的、文化的運動。

在政治上，民主化及獨立化的追尋，從一九七〇年代起，就成爲動搖國民黨統治權力「中國神話」的努力。蔣經國體制以本土化政策因應台灣的民主化，獨立化運動。但這種本土化仍強調台灣與中國的被涵化關係，與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後民主自由到台灣獨立的發展不盡相符，推動民主改革，要求全面改選公職的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是台灣主體性返復的一體兩面。

相對於政治運動，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從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即已展開，到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雜誌蓬勃興起，不斷在意識上解構國民黨統治權力的文化神話，二二八事件的平反運動帶動的台灣歷史研究，逐漸將台灣主體性返復的運動從民間帶向學術研究。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從上下涵容成爲水平對應。

儘管在台灣這個土地上，國民黨統治權力及其周邊帶動的文化政策仍然有意將台灣文化邊緣化爲中國的部份關係，但民間社會發展出來的政治改

革與文化改造論強烈要求台灣文化主體性，並以此主體性去涵化在台灣的中國文化。隨著政治運動的發展，隨著台灣意識的發揚，我們看到從文學、音樂、美術、教育……全面在翻醒的台灣主體性返復的歷史。

面對一九八〇年代起，台灣與中國的新對應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中國事實上與國民黨統治權力所倡言的中國是不同的。如何在台灣的獨立政治實體發展出台灣文化主體性與政治主體性，形成二千一百萬人的命運共同體，形成新的國家意識和文化條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返復，在台灣歷史發展上，有其政治的文化的軌跡，但在建構的道路上，文化面的繁複比起政治而言，是更爲重要的課題。包括人本化的奠基，內部多元族群的尊重與包容，在亞熱帶地緣的地理條件性格所構成的人與社會一人與環境對應，以及以台灣爲主體性發展出來的世界性開展，型塑出近代的以國民及自然人雙重存在的健全人格，是重要的。

長久以來，台灣因爲政治的被邊緣化，歷經殖民主治而倍受外部政治力量帶動的文化宰制和壓迫，台灣文化主體性未能建立及發展。但是，從形勢來看，在歷史發展軌跡中的許多自我萌芽意識以及自一九七〇年代展開的台灣文化主體性返復運動形成了逐漸堅強的力量，正努力地以政治的和文化的雙重重建構發展。我們在文學藝術創作和研究，在學術研究上，看到這樣的建構發展，一方面提供政治改革運動的內部基礎，一方面也從政治改革運動得到動力。